

中共云南一大为何选址查尼皮

为何在一间茅草屋里召开？有哪些人参加？分别代表哪些方面？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光耀云岭

蒙自芷村镇查尼皮村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有一座不显眼的茅草房，这是192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。17名共产党员聚在一起，传达中共中央文件，分析形势任务，通过会议

决议，确定斗争方针和策略，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，照亮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天空。

中共云南一大为什么在一间茅草屋里召开？参加大会的代表是什么人？他们代表了哪些方面？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会议曾被层层迷雾所遮蔽，致使许多问题的答案语焉不详。近年来，随着云南党史研究人员及社科界对中共云南一大研究越来越深入，这层迷雾也被一一揭开。



云南有了党组织

1926年11月7日夜，初冬的昆明已经有了些许寒意。昆明平政街节孝巷24号（现55号）一栋宅院，这是中共党员周霄的家。小院的大门上悬挂有一块清朝皇帝旌表的“节孝”大匾，这成为他们进行地下活动的最好掩护。

11月7日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日子，召开一次改变云南人命运的会议。为了这次会议，他们盼望了多年。

彼时，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，以“唤醒云南青年”为宗旨，在该校进步学生中秘密组织了“云南青年努力会”，先后在省立第一师范、女子中学、高等师范及其附中、成德中学、法政学校、开智印刷公司等学校和单位发展成员，成立支会或小组。到1926年底，会员几乎遍及昆明各中等以上学校，成为领导云南青年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。

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发生英国巡警屠杀无辜群众的“五卅”惨案，云南青年努力会在李国柱的领导下，组织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。8月，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派上海南洋大学云南籍学生、上海学联主任委员、共产党员张永和等人回昆明，宣传“五卅”惨案真相，同时了解云南的情况，联络进步学生。在张永和的启发和引导下，李国柱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
张永和返沪之前，先后介绍青年努力会骨干成员李国柱、陈祖武、吴澄、严英俊等加入共青团，并指定李国柱为在昆明发展共青团组织的特派员，负责团的工作。不久，团中央和李国柱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。1925年9月，团中央批准在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，李国柱任书记。其中一些共青团员成为云南最先加入党组织的成员，李国柱是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共产党员，吴澄是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女共产党员。

1926年，滇籍共产党员李鑫回昆，他的任务是回到云南后建立共产党组织，尽快推翻唐继尧政权，开展工农运动。同一时间，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，周霄、黄丽生等人回昆，与李鑫共同开展工作。

李鑫在当年8月回到云南后，发展了吴澄、严英武、杨静珊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0月，周霄回昆，与李鑫联络后，决定选择时间成立云南共产党组织。

11月7日，李鑫主持了当天的会议，庄严地宣布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。吴澄被选为中共云南特支书记，杨静珊为秘书，周霄、黄丽生专任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。

就这样一个初冬之夜，云南有了党

组织。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，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，把地处边疆、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。

历史选择查尼皮

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，隶属于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领导。彼时，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。而中共云南特支成立后，也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，在云南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。

当时，唐继尧政权盘踞云南，云南特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，首先开展了“倒唐”运动，策动云南四镇守使于1927年2月6日发动政变，将唐继尧赶下台，史称“二六”政变。

政变后，为加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力量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王德三受组织委派回到云南工作，他还带了云南籍共产党员赵琴仙、赵祚传、张世瑾等十多人回到了家乡。这年3月，在中共云南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。

1927年3月8日，在中共云南特委的组织下，昆明妇女及各界群众在南校场集会游行，人数高达4000余人，宣布成立云南各界妇女联合会，这是中共云南特委建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。紧接着，3月12日，昆明数千名学生和工人举行集会和游行，并于5月30日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会和省会学生联合会。

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让蒋介石注意到了云南共产党的力量。他派自己的亲信李宗黄到云南镇压革命。当年11月，李宗黄卫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成德中学学生、共青团员梁元斌，这是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在云南发生的第一桩血案。群情激愤之下，李宗黄不得不收拾行装，灰溜溜地离开了云南。

此后，云南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中共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点燃。在王德三的领导下，中共云南特委派出了党员到云南各地开展工作。从1926年11月云南第一个党组织建立到1927年底，短短1年多的时间，全省党团员从20多人发展到198人，仅昆明就有14个党支部，昆明之外有5个县建立了党组织。

彼时，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蒋介石1927年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汪精卫于7月15日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，以“分共”的名义正式与共产党决裂。大革命遭受失败，年轻的云南党组织即将面对的是力量强大的国民党和地方军阀。

1928年2月，王德三被党指派到苏联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，当年4月，赵祚传、吴少默、吴

澄3人组成临时特委，赵祚传为书记领导全省斗争。1928年6月，赵祚传为筹措党的经费，徒步从昆明步行回家乡大姚，说服父亲变卖田产，拟将全部款项交给组织作为活动经费。就在他准备回昆时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。1929年3月29日，赵祚传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

此时，云南中共地下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。省特委根据1928年5月《中央致云南省临委信》，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。

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，中共云南一大会址选在了远在滇南蒙自的查尼皮举行。

为何选在查尼皮呢？

查尼皮彝语意为形状似人嘴的石岩，是一个苗、彝、汉杂居的小山寨，周围山高林密，十分隐秘。站在村前的山坡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面八方而来的人；而来的即便爬到了距离村子几十米处，也难发现村里的房屋。这里地处蒙自、文山、屏边三县交界处，距离滇越铁路的芷村站仅6公里，距离蒙自县城25公里。当年，这里只有13户人家。

查尼皮村交通方便，人口不多，村庄隐秘，这给大会在这里的召开提供了安全和便利。更重要的是，党在这里的工作开展得早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

早在1927年底，中共云南临时省委成立后，迅速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、矿山及全省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。党在滇南广大农村、工矿企业中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。蒙自成为当时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战斗力最强、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。1928年5月，中共党员黄明俊以小学教员的身份，在查尼皮发展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，创建了查尼皮党支部。同时，在附近的山村发展党员80余人、农协会员800多人。查尼皮这个小村庄成为云南党组织在迤南的重要工作据点。

彼时，白色恐怖之下，查尼皮就像一个宁静的港湾，为中共云南一大召开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场所。如今，屹立在查尼皮的茅草屋，是20世纪80年代根据知情人的描述在原址上按原貌修建的。它作为历史的见证，成了重要的革命遗迹，云南解放后被列入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总有人来到这里，在群山苍翠中，拾级而上，走进那间93年前的茅草屋，抚今追昔，回忆、瞻仰、景仰。

考证出17人名单

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产生及组成，由于历史久远，考证主要是依据部分原始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，而原始资料也是几十年后才留下的只言片语，这成为云南党史研究者的一个难题。

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季介绍：“在

1928年12月16日《云南省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》中，对中共云南一大选举产生省临委委员作了部分介绍，其中有陈廷禧、吴少默、吴澄、张舫、陈家锐、杜涛、杨大经。而其余10名参会代表，主要依据知情人或当事人的回忆来判断。这些资料非常珍贵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但是经过几十年后的回忆，对出席会议代表说法不一，难免存在记忆不准确而产生差错的情况。因此，考证参会代表的工作难度大，同样的材料，不同的研究者，角度不一样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”

这些年，这些分歧和争议主要是：蒙自代表由哪3人组成，特别是其中两名农民代表是谁？石屏学生代表1人是谁？马关知识分子1人是谁？在认定的代表名单中，他们每个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会、各自代表哪个方面？

考证确定中共云南一大代表，既是党史工作深化研究的重点任务，也是解决云南重大党史疑难问题、还原历史真相的客观需要。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代表人员名单，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于2020年5月18日至20日，专门前往石屏县、个旧市、蒙自市等地进行实地调研，与当地党史部门座谈，与部分专家学者展开充分研讨，依据现有历史资料进行充分论证，提出了17名代表的名单。

当年蒙自3人，其中特委之一是吴少默，而李开文、孔发贵则是两位农民代表。李开文是查尼皮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，会议就是在他家的茅草屋里进行；孔发贵则是来自小东山村的村民。

吴纯儒为石屏学生代表。当年并未提及名字，考证组查阅了大量当年的资料后确认是他，中共云南一大召开时，他是一名学生，又担任石屏中学支部和宝秀区委负责人。马关知识分子则为杨大经（杨立人），在他的回忆录及文山州相关县志中确认了这一事实。

经过多方考证，最终形成了一份目前党史学界都比较认可的17人名单：吴澄、李鑫、杜涛、张舫、戴德明、巨柏年、刘玉瑞、吴少默、刘林元、杨大经、黄洛峰、浦光宗、陈廷禧、李开文、孔发贵、吴纯儒、陈家锐。

参加中共云南一大17名代表中，有6人先后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，他们是：杜涛、李鑫、戴德明、巨柏年、张舫、吴澄；其余11人，在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大破坏后，有的被捕，有的转入地下斗争，有的脱离了党组织。只有一人沦为可耻的叛徒，他是这次会议上新当选的临委委员陈家锐。

本报记者 邓建华 黄翘楚 摄影报道
本期顾问 刘季

（本文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特此致谢！）